

“陆丝”与“海丝” 跨越时空的对话

逾500件文物精品亮相广东省博物馆

近日,广东省博物馆(广州鲁迅纪念馆)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“丝路光华:粤陇文物精品联展”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。广东、甘肃两地联手奉上的这场大展,遴选了500件进行展出,其中有许多珍品为首次在广东亮相。

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,连接中原和亚洲内陆,成为“陆上丝绸之路”(以下简称“陆丝”)必经的交通要道;位于华南地区的广东,面向广阔的南太平洋,拥有“海上丝绸之路”(以下简称“海丝”)重要的贸易港口。它们相隔千里,又息息相关。本次由广东省博物馆(广州鲁迅纪念馆)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“丝路光华:粤陇文物精品联展”,让“陆丝”与“海丝”跨越时空相聚广东,探索“陆丝”“海丝”不同文明风采。

展览现场,通过两颗分别出土于甘肃和广东的蜻蜓眼玻璃珠引入展览,采取实物与场景复原相结合的展示手法,带领观众穿越掩埋于荒漠中的古驿站、参观庄严肃穆的石窟、登上蜿蜒曲折的长城,同时配合声、光、电相结合的多媒体互动技术,为观众营造身临其境的观展氛围。

文物赏析

蜻蜓眼玻璃珠

(西汉早期 广东省博物馆藏)



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制作于公元前16世纪埃及地区。玻璃珠纹饰象征神人眼睛,多作护身符之用。蜻蜓眼玻璃珠经欧亚草原向东传入中国,约公元前500年传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。经研究,国内出土发现的最早一批蜻蜓眼玻璃珠为西方舶来品,属于钠钙玻璃。

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此件西汉早期蜻蜓眼玻璃珠,经成分检测为铅钡玻璃,为中国原产,见证了西方工艺中国化以及在国内从北向南传播的过程。

熊踏蹂砖

(甘肃省酒泉市下河清农场采集 甘肃省博物馆藏)

熊饰空心砖踏蹂

(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)



熊踏蹂砖。



熊饰空心砖踏蹂。

熊寓意着勇猛和强悍,商周时期已是常用的装饰题材。至秦汉时期,熊的艺术造型更加丰富多彩,代表着拥有者特殊的身份地位。汉代以熊做装饰的残砖在甘肃酒泉和广东广州皆有发现,纹饰皆作熊正面踞姿状。

翼兽青铜提梁盃

(春秋 甘肃省博物馆藏)

这件青铜提梁盃出土于甘肃省泾川,巧妙地设计成一只具有双翼的四足兽,以龙为提梁,以凤为盖钮。据研究,翼兽形象早期流行于中亚、西亚地区及亚欧草原,传播到中国约为战国时期。



胡人牵驼图模印砖

(唐 敦煌市博物馆藏)

这件胡人牵驼图模印砖出土于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。骆驼素有“沙漠之舟”之称,为商队驮载商品,往返于丝绸之路上。河西走廊干旱少雨,骆驼温顺亲近,负载能力强、行走耐力好,是陆上丝路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。胡人牵驼是河西走廊商旅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骆驼背着十字捆扎的椭圆形驮囊,里面装载着丝绸、瓷器、香料等商品。甘肃省出土不少唐代驼俑明器,说明了当时骆驼跟其他牲畜一样都是财富的象征,反映出河西走廊的日常生活中商业。



鸽子纹锦残片

(唐 甘肃省博物馆藏)



中国丝绸西传罗马帝国后,备受贵族青睐,因而促进丝绸贸易的发展,各国使者和商旅将中国精美的丝绸源源不断运往波斯、罗马。中外考古发掘表明,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繁多,色泽绚丽,工艺精巧,技艺高超,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,丝绸不仅是中国的单向输出。隋文帝就异常喜爱来自中亚的“波斯锦”,命人积极学习,促进了中国丝织技术的发展。

波斯蓝釉陶瓶

(南汉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)

这件波斯蓝釉陶瓶出土于广州大马站景豪坊工地。波斯蓝釉陶瓶多数作为香油、葡萄酒、蔷薇水等液体的储运容器,大多是唐五代时期从西亚引入。此类陶瓶在我国广州、福州、扬州、宁波、桂林等沿海地区均有发现,国外则分布西起非洲东海岸、东抵日本。



影塑飞天

(北魏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)



这件影塑飞天出土于麦积山石窟第133窟。麦积山石窟,自后秦开凿以来,经历了数个朝代的重修、扩建和开凿,距今已有1600余年,与莫高窟同为四大石窟之一。麦积山石窟艺术精髓在于泥塑、石刻,但其壁画也极为稀罕,也曾是“有龕皆是佛、无壁不飞天”,如今现存有1300余平方米。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斧形龙纹黄玉佩

右图所示为一块清代的玉佩,黄玉质,色如蒸栗,包浆油润,局部有褐色沁。器体扁平,片状,两面纹饰相同。主体巧做商周斧钺之造型,斧中部以两道弦纹分为三区,上区留白,打磨光亮,中区以四组变形夔龙纹装饰,下区刃部饰涡纹,皆以剔地浅浮雕为之。斧周身出廓镂雕螭龙纹,龙攀爬于佩顶部,昂首前视,凸目宽吻,长须飘拂,通身鳞片以极细网格纹描画,器宇轩昂,矫健婉转;佩身两侧雕出卷云纹,下出戟透雕火焰海水纹样,作奔涌翻卷状,线条飘逸灵动,营造出慑人气势。

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娄坚扇面行书飘逸洒脱



明崇祯元年(1628年),苏州府嘉定县命谢三宾合刻当地名流店时升、娄坚、程嘉燧、李流芳四位先生的诗文,命名为《嘉定四先生集》,“嘉定四先生”因此得名,亦称“嘉定四君子”。

这幅行书扇面,即为“嘉定四先生”之一的娄坚所书。作品纸本墨书,纵19.5厘米、横52.5厘米,款题:“同友人过唐氏园坚”,钐“子桑”白文方印,字体飘逸洒脱,章法生动自然,耐人品味。(据《收藏快报》)

明嘉靖江正玄玉墨



明代麻三衡《墨志》和清代《渔洋精华录》等书中,均有对江正制墨的记载,但传世实物仅此锭。

此墨呈圆形,墨饼两面均凸起边框,墨面雕刻一条螭龙。墨饼螭龙戏水纹样见于明嘉靖时期,流行于晚明,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。

“嘉靖庚子”为明代嘉靖十九年(1540年),墨背题阳文篆书“玄玉”,墨侧题“嘉靖庚子晴川江正制”。此墨见于《中舟藏墨录》,是流传有绪的明墨精品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唐代三彩南瓜



西安市临潼区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唐代三彩南瓜,出土于西安临潼庆山峙遗址,半径约10厘米、厚约8厘米。

这个三彩南瓜属于唐三彩。唐三彩是一种多色彩的低温陶器,它是以细腻的白色黏土作胎料,用含铅的氧化物作助溶剂,目的是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,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。这个三彩南瓜美轮美奂,是1200多年前的唐代珍贵文物,对后人研究佛教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(据《收藏快报》)

题画诗中的隐者旨趣

由于朝代更迭等原因,古时一些忠义之士、饱学文人往往遁迹山林、甘老林泉,不再过问世事。山林之野,远村之趣,或策杖访友于深山茅舍,或携琴观瀑于古树巨岩,或泛舟垂钓于野渡清溪,或终日对弈于松林之间,或月夜吹箫于山间亭阁,或雪日高卧于草堂之上……这些都是古代隐士所追求的生活内容,充满了隐者的悠然旨趣。



清代髡残的《山水册》之一,描绘了群峰绝壑间隐者结庐的生活画面,上有题画诗。

对于远离红尘、放浪山水的隐居生活,古代文人画家亦信奉此道。“衡门植五柳,东篱采菊丛。长啸有余清,无奈酒不足。当世宜沉酣,作邑召侮辱。乘兴赋归欤,千载一辞独。”这首五言古诗,是宋末元初画家钱选在他的一幅《归去来辞图》上的自题诗,与画意契合,讲述了东晋陶渊明辞官归隐、植柳种菊自得其乐的隐逸故事。

《归去来辞图》是钱选以陶渊明辞赋《归去来兮辞》为题材创作的。画上这首题画诗,发出了“当世宜沉酣”的感叹,亦坦露出作者向往隐逸、不为俗羁、不为物役的自然心态,孤高气节,显露无遗。他十分崇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操守,还创作过《扶醉图》《陶渊明像》等多幅与陶渊明相关的作品。

比钱选小41岁的吴镇,画艺精湛,卓有成就,虽然名列“元四家”,却隐居乡里,布衣终身。他的作品充满了乡居生活的轻松惬意,无论是芦花寒雁、松泉飞瀑,还是芦滩钓艇、草亭诗意,无不充满隐者之乐。他在一幅《草亭诗意图》上题了一首诗:“依村构草亭,端方意匠宏。林深禽鸟乐,尘远竹松清。泉石俱延赏,琴书悦性情。何当谢凡近,任适慰平生。”勾勒出一片闲适的乡居生活场景,寄托了画家推辞一切凡俗事务,在乡村草亭里得到慰藉平生烦乱心灵的向往,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归隐山林的良好愿望。

元代画家受时局影响,笔下常常出现“渔隐”的主题。吴镇另一幅《芦滩钓艇图》上,波光潋滟的河流,一叶带篷的扁舟,钓鱼归去的渔翁,无不体现出渔村生活的宁静与祥和。

到了清代,朱耷、石涛、髡残、弘仁被誉为“清初四画僧”,这是一个隐逸界的画僧群体。



元代吴镇的《芦滩钓艇图》,刻画了隐者钓鱼而归,寄情山水的逍遥生活。

他们皆为明末遗民,因不甘臣服于新朝,便遁入空门,借助诗文书画,抒写身世之感。其中髡残为人刚直不阿,抗清失败后避难于湖南常德桃花源,后落发为僧。他的《山水册》中,有一幅描绘在群峰绝壑间结庐生活的画作,其上题诗一首:“绝壑无人独结庐,樵阴昼落一床书。已窥东汉多名士,唯有焦先丑不如。”焦先为汉末著名隐士,也曾结庐于河边,独守孤高气节。髡残以焦先自比,突出了作品中的隐逸风骨。

游山赏水,临渊观瀑,是古代隐士寄托心扉的一大喜好。清代画家顾殷的《听松观泉图》上,悬崖峭壁,茂松虬曲,两位老年隐士隔深涧观赏水流婉转而下。画右上空白处有画家自题一诗:“一雨垂垂两日连,坐令五月意萧然。置身如在重岩底,耳听松风眼看泉。”诗意与画意完全吻合,描述了初夏时节隐士相邀观瀑的闲情逸致。

古代文人画家以题画诗的形式,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倾注于咫尺画幅之间,那种淡泊名利的隐逸旨趣,令人为之感怀。

(据《西安日报》)